

重点
阅读

《观我生》:天堂在虎穴中

□李敬泽

雾霭沉沉,有雾的日子里方知空气原是物质,这口气,它的密度、重量,它黏稠的触感,一条混浊沉重的大河在身体里缓慢地循环涌动,压迫着身体,贴向土地、尘埃。

贴向物质、权势、虚荣……

贴向那张银行卡。

深夜了,看完了《观我生》。我是说,看到了银行卡上的名字。

这是一篇序,将要放在书的前面。所以,为防“刷透”,我要慎用我的“先睹”特权,人的命运已不然,但我不打算告诉你们,让你们自己随着这书经历波诡云谲,经一场梦幻泡影。

谈谈另外的事吧。

比如谈谈尼泊尔和不丹。

多年前,我去过尼泊尔,读这本书,我发现书里的男人女人,他们的行程与我当日基本一致。我去了是白去,可她和他,此一去却成就了一个好故事。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到尼泊尔,那么,这本书带你再去一次,去得荡气回肠;而我没去过大,看了这本书就便觉得,有生之年要去,去《观我生》的不丹,如此方才无憾。

啊,这本书的作者跳起来了,你把这本书当导游手册了吗?

好吧,有时小说就是导游手册。比如《尤利西斯》,据说,你现在仍然可以准确地按照布卢姆1904年6月16日的路线漫游都柏林——当然这说明都柏林的城市改造实在太慢,他们需要进口一个市委书记。小说给这个世界最美妙的馈赠之一,就是,当你走在一座城市、一片山水中时,你意识到你与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同行,他们,那些虚构的人,在你心中奔走,怀着激情、欲望,把他们的笑和泪和喘息和气味铭刻在砖石草木之间,由此,这些地方不再是地理的、物质的,也不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它是你的记忆,某种意义上是你的前世今生,是你如此陌生如此熟悉的地方。

比如现在,我就在尼泊尔,在巴格玛蒂河边、在大佛塔、在杜巴广场,在五光十色的人群中,我注视着一个女子正在寻找一个男人,他们有时同行,但转眼失散。这个女子,她的脸上混杂着焦虑、脆弱、孤独和执拗,她的眼睛和神情和姿态都在寻找,好像她一直不在此时此地,她丢了什么,或者她丢了自己。

寻找,不管是寻找宝贝还是真相还是意义,都预设着目的和方向,但小说家们对人类行动的目的和方向总是深怀疑虑。不疑虑的不是小说家,而是成功学家。小说家们所信的只是,自由意志总会把我们带向意料之外的地方,人之自由,与其说是为了抵达某个目的,不如说是,人愿意承受自由本身,它的



孤独无助、它的可能和不可能。就如《观我生》这样,所有的人都在寻找,寻找所爱、寻找所梦、寻找所在,而被寻找的人也在寻找,世界如同一份无解的寻人启事,人们该有多么孤独。在这茫茫世上,在这本书里,好像人之为人、好像生命之为生命,就是为了寻找。

也是为了逃离。

这本书在远行和归家之间展开,在两个“天堂”之间展开,家在“天堂”、在杭州,但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在远方,在世界的尽头,在青藏高原,在不丹,在寻找的终点或者寻找的路上。

它的力量是慢慢呈露出来的。至少一开始我不能说我喜欢这部小说,它看上去似乎起于奢侈的闲愁,有关财富、厌倦、叛逆、出走等等,不过是老生常谈,很文艺,做作的夸张,把这份闲愁弄得特别重大。

但是,渐渐地,这件事真的重大和紧迫起来。小说家有时需要专制,他不讲民主,他无视我们关于事物的一般看法,他有足够的好足够的坏和足够的疯狂,他能像带领一个国家一样,把我们强行带入一个设定和规划的境界——在这里,他重新安排生活和

世界,他强行规定,某些事毫无意义,而某些事意义极为重大,以至于成为了世界的重心。

在《观我生》中,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叛逆和逃离就渐渐变成了一次惊险宏大的长征。作者鲍贝把不自然变成了自然,把做作变成了创造,她非常非常坚决,她软硬兼施,运用悬疑、好奇、威胁和应许,诱惑、号召、激励着我们,把我们带向一个乌托邦。

这个乌托邦在不丹。准确地说,不丹是这个乌托邦在人世的投影。

当然,我们知道,那里有童话般的国王和王后,那里是梁朝伟还有谁谁结婚的地方,那里是全球化的逻辑惟一遗忘的地方,那里是西藏的西藏,那是滚滚向前的历史不慎遗落的一个神龛,让全世界的大小有产者寄托他们的梦想,如果他们还有梦想的话。

但是,在这本书中,乌托邦漂浮在不丹之上,它应允着救赎,是一个秘教的天堂,一种执念、一种黑暗狞厉的内在体验,我是说,天堂就在虎穴,这里有种毁灭的冲动——是光明,是燃烧,是生命的沉醉和狂喜,也是毁灭,是飞蛾扑火,是以身饲虎。

人们历经千辛万苦,经受堕落和苦难,是为了寻找和走向那个美妙的天堂般的死亡和救赎。

但那又怎样呢?我们受苦、堕落,即使我们不向着那里去,不去不丹虎穴寺,那又怎么样?人不是反正会死吗?

这有什么不同吗?

是有所不同的吧。前者是自由意志,是选择和决断,而后者则是顺受一切,是在尘世中修炼不死之术——现代性的根本前提,或许就是假设了人是不死的,把死悬置在意识之外,在这个前提下,人世间的一切才是绝对有意义或有意思的,爱欲嗔痴、占有和进步、消费和成功。

所以,这本书的最后是有大悲的,所寻找的所有人都去了死了,寻找者遗落在世上,她在另一个“天堂”,在杭州,那里是无限繁华,她的心无尽荒凉。

那张银行卡提醒她,她的长征或许从来没有走远,她在本质上还留在原地。

不丹在天边外。

雾霭填塞着我,让我觉得生命是如此地具有质感,黄土尘埃渐渐地将我们掩埋。

这种时刻,读《观我生》,我想象还有人与我同读,这世上还有人,心在高原,想象着天空和飞翔,想象着无色、透明、接近于无限透明的空气和空,想象着救赎和自在。

(《观我生》,鲍贝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常可以回到陆河县,为什么要表达“故乡”已经“回不去”呢?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地理上的故乡,无论多远,借助现代交通工具都可以做到随时回去;然而“现而今,曾经的那些历史、传统、文化,通通都变味了”,这让返乡的人触发了更多的乡愁,“回不去的故乡,让人永远记挂在心头,那时的山,那时的水,那时的人们……”

幸而在广东特别是行政区划上的潮汕地区、文化意义上的客家文化地区,传统被抛弃的速度明显慢于国内大部分地区。幽壹本人在网上就经常跟我谈起“擂茶”——在陆河等广东市县和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饮食方式仍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祠堂处处可见,祈福、丧葬等旧有宗族仪式令人惊叹地延续着,潮汕人、客家人也更加努力地保存着方言传统。可以说,走访粤东地区,接触潮汕人、客家人居民,我们会惊叹于“传统”的生命力以及维护传统的人们的认真态度。

归结起来,潮汕地区居民、客家族群的人们确实都有相对更好的条件去用书面文字记录地域和族群传统。幽壹在这本书中,打破了岭南地区文化的这种内敛型特点,没有仅仅满足于以口头表达、朋友间交流等小范围沟通方式,来介绍他的家乡和故乡传统,而是认真整理出六大片章,这当然就是陆河客家人文化记忆的书面化。这种书面化,本身就是对过去和未来形成塑造。文化记忆是经历、信息、事件和社会记忆的集合体,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很难再通过口头相传的方式得以实现,通过书面化传承,不仅可以保证某种准确度,而且还可以反映出变化过程、相关的社会背景等信息。这样一来,传统就将通过书面记录带人到对未来文化和社会的塑造,“故乡”的信息也获得了部分保全。

幽壹在书中写道,陆河客家人的传统民俗已趋淡化和简化。这固然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都市化社会的必然结果,但绝不意味着传统民俗就该被彻底扫入故纸堆。在我国台湾地区、海外华侨聚集的地区以及日韩等国,传统民俗都与都市化生活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些地方或国度的人们也更为重视传统价值——也正因为此,很难从那些地方或国度听说我国内地经常曝出的“拆除真文物,复建假古迹”的荒唐事。事实上,传统民俗及作为内在的的传统价值,更能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

这正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令人深思的问题。那些旧时的乡村器物,包括作为生产工具的农具、作为农业社会生产组织和资源组织方式的工匠及技艺,以及伴随陆河客家人儿时成长的玩具、游戏方式、生活经验等等,都在加速消失之中。尤其是乡村器物,相比传统民俗更是遭到了忽略、忽视和遗弃,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传统器物伴生的价值理念。正如稻盛和夫笃行的“敬天爱人”经营哲学,实际上我国各个地方的农村,长期以来也都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来维持生产和生活的运转,反映出浓郁的生态和谐意识。又如,幽壹书中提到的石匠、木匠、补锅匠等“手艺人”,在乡土社会和农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最有效、最节约地利用了资源,避免因人的欲望、生活需要造成对环境的过度索取和严重破坏。而石匠、补锅匠等角色,现今在农村再也难寻踪迹,更具破坏性和浪费性的生活方式,则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环境问题。这样的变化,究竟算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还是具有讽刺性的局部倒退呢?

(《回不去的故乡》,幽壹著,万卷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我们这一代人、上一代人以及前人们熟悉的那个“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只剩跟故乡同名的某个地方,以及我们残存的对那个“故乡”的记忆。在这种时候,我们才会察觉到记忆的脆弱性——你若从未留意,就会陷入大量记忆符号构成的混乱及相互干扰之中。或许从这一点来看,幽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才显得弥足珍贵。

在这本书中,幽壹非常翔实而形象地描绘了其家乡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的传统民俗。幽壹本人生活在广东深圳,经

我做了一只梦。在梦里,我变成了一个无比忧伤的女人。醒来之后,我试图描述我的梦境。令人沮丧的是,我根本无法用文字去完整而准确地描述出梦里所发生的一切。然而,那份感觉真切又缥缈,它分明抓着我的心,却又难以触摸。我看不见它,可是我知道,它就在那儿。它如此强烈地占有我的感知,占领我最敏锐的触角,我那样迫切地想要与人分享我的梦境。

我每写一部小说,也如同遭遇一场场梦境。它首先在你心中成型,除你自己感知之外,谁也看不见它的形状,你对谁也说不清楚,你只能通过文字去试图描述。而当你落笔的时候,它就已经偏离了最初形成时的模样。它能够在你的文字里走到哪一步,走过哪一个角落,穿过哪一片河流与山川,都是不能够事先被操控的。你惟一可以做的,就是紧紧抓住你最初的感动,去完成你的书写。

写完《观我生》这部小说是在6月底,7月初我又到了拉萨。在飞机上我又重读了一遍。朋友多吉顿珠来机场接我,在他家里,我见到了几位藏族朋友。他们身居高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经历和遭遇,令人震惊和错愕,荒诞之程度我连想象都难以抵达。他们的信仰和经历有我小说里的形状,或者说,出现于小说里的情状,正巧在他们身上也有发生。然而,比起他们自身的经历,我在小说里所提供的想象的细节是如此匮乏和荒凉。

我所遇见的那些人和经历的生活,远比我的小说更具复杂性和冒险精神,这一点毋庸置疑。生活如海洋广阔无垠、无边无际,小说只是海面上偶尔浮起的一朵浪花。而每一朵浪花如幻梦,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何时开始,又会在何地终止,都是不确定的。浪花存在于大海,而对大海来说,是永远没有边界,也永远不会有终结的。

饭后,和多吉他们说着话,茶早已凉了下去,我坐在那里,又想起小说里的一些细节,眼角红了一下,觉得自己有所顿悟,似乎进入了某种觉醒。

刚写完小说那天,我接到多吉电话,他说,你来拉萨吧,我带你去看看八廓街的一座大院,你也許会喜欢的。

那座大院叫“拉让宁巴”,即“旧皇宫”的意思。这是一座建于唐朝的藏式大院。五世达赖的寝宫曾设在这家院子里,在他之前,是藏文字和古藏香的发明者吞米桑布扎的府邸,这是一座充满灵性的四合大院,上下三层,紧挨着大昭寺,爬上楼顶能看见布达拉宫。大院门外,有一棵千年柳树守护,据说,还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随行带来的树种所栽。这样的院子,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多吉说,喜欢就好,我去拿下来,我俩随即签了协议。协议是我起草的,他不太懂汉字,我读给他听,他听完说好,我们各自签字摁了手印。仪式简单而隆重。

然而,我还是有所顾虑。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经营,我不想放弃我的旅行和写作。多吉轻描淡写地说,院子可以请人管理,你随时可以去旅行,想来拉萨你就来,在这家院子里,你想写作你就写,写累了,你就去八廓街上逛逛,逛累了玩累了,再回到院子里。那时的院子一定开满了格桑花,你可以剪些鲜花去装扮你的房间,总之,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起来,完全就像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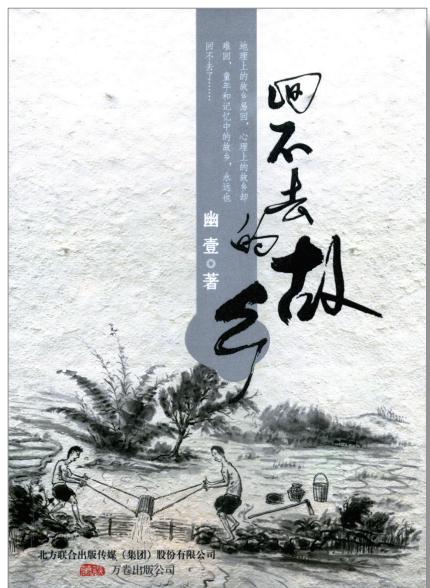
一个对汉语并不十分娴熟的康巴汉子,能够说出这番话似乎很不合逻辑,但那些不合逻辑却仍可以理解的情节还是颇令人玩味。或许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有一种暗藏的、隐蔽的秩序,建立在这些秩序之上的正是他所描绘的神话般奇妙的梦想。

不过,在拉萨,有这么一座院子可以让我去写作或者玩,心里只是觉得好,无端地涌起些感动。虽然,它仍然是只未完成的梦,就如一部还未写完的小说。

在我的生活中,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梦境,哪部分又是小说,几乎是混淆不明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所经历的梦境般的生活是否太像小说,而我的小说,是否是我通过转换虚构的脱离现实生活另一种梦境,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有谁见过我的梦境?不说也罢。

用书写捍卫故乡的记忆

□ 郑渝川



常可以回到陆河县,为什么要表达“故乡”已经“回不去”呢?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地理上的故乡,无论多远,借助现代交通工具都可以做到随时回去;然而“现而今,曾经的那些历史、传统、文化,通通都变味了”,这让返乡的人触发了更多的乡愁,“回不去的故乡,让人永远记挂在心头,那时的山,那时的水,那时的人们……”

幸而在广东特别是行政区划上的潮汕地区、文化意义上的客家文化地区,传统被抛弃的速度明显慢于国内大部分地区。幽壹本人在网上就经常跟我谈起“擂茶”——在陆河等广东市县和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饮食方式仍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祠堂处处可见,祈福、丧葬等旧有宗族仪式令人惊叹地延续着,潮汕人、客家人也更加努力地保存着方言传统。可以说,走访粤东地区,接触潮汕人、客家人居民,我们会惊叹于“传统”的生命力以及维护传统的人们的认真态度。

归结起来,潮汕地区居民、客家族群的人们确实都有相对更好的条件去用书面文字记录地域和族群传统。幽壹在这本书中,打破了岭南地区文化的这种内敛型特点,没有仅仅满足于以口头表达、朋友间交流等小范围沟通方式,来介绍他的家乡和故乡传统,而是认真整理出六大片章,这当然就是陆河客家人文化记忆的书面化。这种书面化,本身就是对过去和未来形成塑造。文化记忆是经历、信息、事件和社会记忆的集合体,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很难再通过口头相传的方式得以实现,通过书面化传承,不仅可以保证某种准确度,而且还可以反映出变化过程、相关的社会背景等信息。这样一来,传统就将通过书面记录带人到对未来文化和社会的塑造,“故乡”的信息也获得了部分保全。

幽壹在书中写道,陆河客家人的传统民俗已趋淡化和简化。这固然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都市化社会的必然结果,但绝不意味着传统民俗就该被彻底扫入故纸堆。在我国台湾地区、海外华侨聚集的地区以及日韩等国,传统民俗都与都市化生活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些地方或国度的人们也更为重视传统价值——也正因为此,很难从那些地方或国度听说我国内地经常曝出的“拆除真文物,复建假古迹”的荒唐事。事实上,传统民俗及作为内在的的传统价值,更能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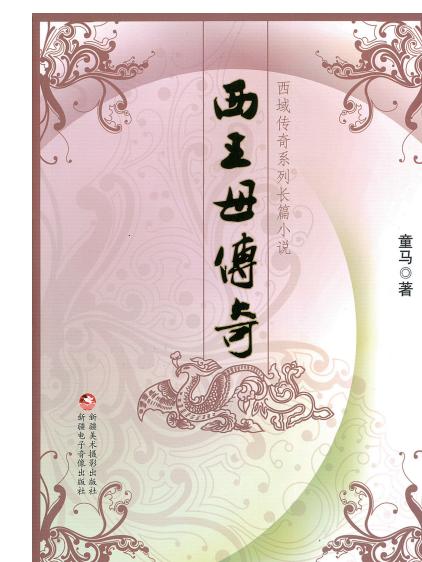
这正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令人深思的问题。那些旧时的乡村器物,包括作为生产工具的农具、作为农业社会生产组织和资源组织方式的工匠及技艺,以及伴随陆河客家人儿时成长的玩具、游戏方式、生活经验等等,都在加速消失之中。尤其是乡村器物,相比传统民俗更是遭到了忽略、忽视和遗弃,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传统器物伴生的价值理念。正如稻盛和夫笃行的“敬天爱人”经营哲学,实际上我国各个地方的农村,长期以来也都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来维持生产和生活的运转,反映出浓郁的生态和谐意识。又如,幽壹书中提到的石匠、木匠、补锅匠等“手艺人”,在乡土社会和农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最有效、最节约地利用了资源,避免因人的欲望、生活需要造成对环境的过度索取和严重破坏。而石匠、补锅匠等角色,现今在农村再也难寻踪迹,更具破坏性和浪费性的生活方式,则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环境问题。这样的变化,究竟算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还是具有讽刺性的局部倒退呢?

(《回不去的故乡》,幽壹著,万卷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开卷絮语

呈现人神共居的奇妙世界

□馥 伊 陈文



继去年推出长篇谍战小说《索密——谍战大西北》之后,童马今年又出版了《西王母传奇》。作者之所以钟情于西王母,以30年漫长的构思时间不断完善这部长篇传奇小说,就在于他认为西王母不仅是新疆的,也是全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她的形象有着广泛的国际意义。世界上崇拜西王母的信众多达数千万,这些信众视西王母为母亲神、中华母亲、母亲娘等。天山天池的西王母祖庙影响最大,人们一般认为天池即是西王母居住的仙境。世界各地的信众每年不远万里前往天池拜谒西王母祖庙,以表达对西王母的虔诚之意。

因此,童马多年来一直不余遗力地书写西王母。早在1986年,他就写出了6万余字的连载小说《瑶池情》。乌鲁木齐市文化局和秦剧团依小说原型创作的古装戏《瑶池情》于1989年正式上演。此后,童马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听取史学专家和有识之士的建议,以实践验证他创作成效的优劣。经过反复的思考,他果断地避开了束缚创作手脚的神话和传说,摆脱开人们习惯于的关于西王母的老面孔,决定推陈出新,为西王母的一生编织崭新的故事。

为此,童马又大量地阅读了关于道教的历史资料和西王母、老子、穆天子及其他有关人物的资料,阅读了关于宇宙探秘方面的书籍,开拓了视野,从而选准了长篇小说的定位,重新布局结构,设计人物关系,编大容量、大篇幅、大气派的故事情节。他从西王母的诞生写到她的死去,从地上写到天上,从神州写到宇宙,从凡人写到神仙,从死亡写到复活,从复活写到外星人……他给西王母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填补了西王母仅有虚名而无实际业绩的空白,使一个活生生而又多灾多难、九死一生的女王形象,一个得道成仙的充满人性的母亲神,活灵活现地呈现于世。

童马的这部小说有很深的寓意,潜在的内涵又很丰富,暗示的手法激起读者诸多思考。按理说西王母作为西域的女王,穆天子身为西周的天子,老子作为大贤大智的道家始祖,可谓权大势众,能够一呼百应、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了。然而在小说世界里,他们却处处受人之掣,显得力不从心、万般无奈。他们虽然智高权重,却阻力重重,三劫九难十一灾,让他们吃尽了苦头,饱尝了人世与天界

的酸甜苦辣和生死磨难,最终他们以神仙之身离开凡世,飘飘入仙界天宫,效劳于宇宙智圣王的伟业。这实际上是对纷争不休的人类的逃逸,遁世入仙境,意味着安享清闲的归隐,就像老子逃避现实悄然归隐天山天池是一个道理。西王母和穆天子在人世上情缘无果,难遂人愿,在天宫却结为伉俪,这说明他们在地球人类中可谓困难重重,难以实现久怀情缘的理想。外星人在他们遇难的过程中大施法力,使他们死而复生,这又